

五次浪潮

当兵热 ■ 从政热 ■ 文凭热 ■ 出国热 ■ 经商热

勤工俭学热



五 次 浪 潮

当兵热·从政热·文凭热·出国热·经商热

萧勤福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五 次 浪 潮

当兵热•从政热•文凭热•出国热•经商热

萧勤福 等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8.375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6 000 册数：1- 13500

*

ISBN 7-300-00697-3

0·41 定价：3.50元

目 录

序	1
第一次浪潮：当兵热（刘立云）	6
一、绿色狂潮：1966—1976年.....	7
二、当兵热：无法回避的反思.....	16
三、悲壮的尾声，抑或新生的阵痛？	31
第二次浪潮：从政热（杨晓伟 崔少鹏）	36
一、万头攒动的红道.....	36
二、动机背后的动因.....	49
三、历史旋律的变奏.....	71
四、时代的呼唤：改革官本位.....	85
第三次浪潮：文凭热（刘向阳）	98
一、黑色旋风：文凭热的涨潮	100
二、盛极而衰：文凭热的落潮	111
三、表象下的涌流	115
四、潮涨潮落牵动的思绪	131
第四次浪潮：出国热（萧勤福）	138
一、出国，新绿色和平运动	139
二、蓝色梦幻：躁动的生命与平静的社会	155
三、赤橙黄绿青蓝紫：出国热的沉淀	172

第五次浪潮：经商热（萧勤福）	191
一、九州风雷：全民皆商冲击波	192
二、四面云集：动机与时机	222
三、八方回音：困惑与思考	242

序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在超稳态下运行，一定会由于结构老化，内耗增加而出现活力不足，最后陷于衰落。而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在非稳态下运行，结果也一定会是同样。因为，长期的无序运行，必定会强化社会结构的剧烈错动，引起内耗增加，疲劳度提高，最终导致活力不足而陷于衰落。

这是历史慷慨地赐予人类的一条可宝贵的社会发展规律。

然而很不幸，中国社会发展恰好忤犯了这一大禁忌。从秦始皇一统六合之后，中国社会在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下，很规范地运行了两千年，最后在老大的清帝国手里，落得个丧师赔款割地俯首的下场，沦为弱者。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社会的超稳态运行，却开始了至今还不能说已告终结的非稳态运行。接踵而至的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战争时期自不待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我国社会照样都处于非稳态运行之中。长期非稳态运行的结果是，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待发展国家。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其长远的

非政策目标旨在结束中国社会的非稳态运行，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结构重组，非稳态运行不仅不可能立即消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加剧了。不惟如此。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还出现了另一方面的新情况，对非稳态运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新情况就是本书所要阐释的对象——当代中国社会五次浪潮。

所谓当代中国社会五次浪潮，指的是从60年代中期以来相继兴起、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五次大规模“热”潮：当兵热。从政热。文凭热。出国热。经商热。在具体的时间序列上，这五次浪潮的发生具有明显的继起关系，一浪一浪陆续涌起，后浪赶前浪。然而在它们的发展与持续上，则往往具有并存或交叉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例如从政热与文凭热相并存，出国热与经商热相交叉。在规模、范围上，从影响的角度看，五次浪潮基本相同，都覆盖了整个社会，席卷了各个社会集团；但如果从集聚面或侧重点看，它们之间又有所不同。当兵热、出国热主要集聚于青年之中，从政热、文凭热和经商热还包括了中年人；从政热、出国热主要“热”在城市，当兵热、文凭热和经商热则把农村也“热”在其中；从政热、文凭热、出国热主要集聚于知识阶层，经商热、尤其是当兵热则更多地侧重于非知识阶层。

五次浪潮以其磅礴的势能，猛烈地冲击了当代中国社会。其“热”度变化和实际影响，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五次浪潮是一种有节律的社会现象，有兴有衰，有涨有落。但是，它们的兴衰涨落，并不仅限于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也留下了它们活动的清晰轨迹。而

且，它们的节奏不仅通过人的行为或行动中的人来实现和表现，还通过人们的思想观念或社会思潮来实现和表现。因此，这五次浪潮是从四面八方涌来，扫荡神州大地，又不分东南西北地冲去，回音响彻九州方圆。它们浮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的表层，又潜涌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中国社会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在它们的冲击下发生了形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价值观、人生观、行为评价模式、择业标准、伦理道德观等等，都起了或者巨大或者微妙、或者明显或者隐蔽的变化。人们的行为及行为方式如择业行为与就业方式、交往行为与交往方式、管理行为与管理方式等等，也都相应于每一次浪潮而发生了变化。在此基础上，政府的政策和行政，社会职业集团结构与社会利益群体结构，社会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社会生产要素的聚集、游离、分配、组合与使用等等，无不出现不同于以前的某种状况。

对于五次浪潮的上述基本评估，构成本书立论的基础：通过研究与甄别，比较系统地概括、描述各次浪潮兴衰的过程和情状，寻找其原因，分析其影响，把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运行的某一侧面，剖露于人前，以期唤起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变化的反思，引起人们对我国社会运行状况和变动趋势的关注。

本书将运用实证方法，以白描手法将五次浪潮兴衰的脉络表现出来，推出大量资料，力求生动、准确地反映各次浪潮中人们各式各样的心态或社会心理状况，给读者创造一个思考的基础和空间。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本书将使用由个别到一般的分析方法，概括各次浪潮对我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与影响，阐述它们之所以在某一特定时点上和

某一特定环境中兴起与衰落的缘由。本书还将利用历史方法，把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联结起来，在纵横交错的历史联系中透视、分析各次浪潮，使之能够展现更多的深层内涵。

五次浪潮提供了许许多多思想线索，循着这些线索，人们将能够获得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东西，裨于人们未来行为的设计、控制与评价，裨于未来社会的调控和稳态运行的出现。

这些思想线索包括：（1）五次浪潮的相继兴起与衰落是否只是历史的偶然？如果说它们不可避免，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怎样解释其具体含义？（2）五次浪潮是不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某种病态？它们与社会发展程度或成熟程度的关系如何？如果是病态，怎样正确地予以阐释，其社会生成机制是什么？（3）五次浪潮与政府行为有什么关联，关联度有多高？政策选择的牵引力是否重要？是否可以通过政策变换来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来影响人们的利益选择和利益谋得方式，来重组社会职业集团和社会利益群体？（4）五次浪潮意味、表现着中国文化、社会心理结构的哪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导致怎样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应做怎样的价值判断？（5）在五次浪潮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将可能如何演变，今后是否还可能出现第六次浪潮、第七次浪潮？我国社会运行紊乱能否通过诸如限制、消除非规范决策方式和行政方式之类的措施来缓解或消除？

本书沿着这些线索作了一些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见解和判断。如果读者能在评价这些见解、判断的基础上，得出一些与它们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将感到欣慰；这样无疑于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本书的价值。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结果：“第一次浪潮”由刘立云撰

写，“第二次浪潮”由杨晓伟、崔少鹏撰写；“第三次浪潮”由刘向阳撰写；“序”、“第四次浪潮”、“第五次浪潮”由萧勤福撰写。萧勤福负责全书的协调工作，并对部分章节作了一定修改。

第一次浪潮：当兵热

引 子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只需前推20年，善良而自负的中国人谁也不可能想到不久的将来竟会有人在报刊上用黑体字发出这样的警告：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

尽管中国的20年前乃至更长一段间的历史，是颠颠倒倒如同醉酒似的，以至事后想起这段历史都不免心尖颤悚，抑或哑然失笑，但有一条却让人们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思及心潮难平，且每每产生不解之感。这就是持续了20余年的当兵热。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投身从戎，保家卫国，愿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甚至生命奉献给时代，其精神与行动都是难能可贵的，在任何形态的社会里都是积极而应该受到推崇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知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回避，人们对产生这股当兵热现象的特定社会基础以及它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思索，终于导致当这股热潮化雪般地退去之后的极大震颤和

极大恐慌。

困惑，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一、绿色狂潮：1966—1976年

历史进入1966年5月，中国忽然跳进了长达10年的大动乱。动乱以“打倒一切”开始，短短数月便让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厂都陷入全面瘫痪。人们发疯般地狂呼，发疯般地奔走，虔诚得“头可断，血可流”。忽然间领导扫地出门，权威负荆请罪，整个世界都被颠倒了。这时唯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军队还在基本正常运行，随着运动的深入，军队虽然也难逃冲击和震荡的厄运，但又出现了罕见的奇迹——它威严而略带神秘的大门屡屡被汹涌的“无限忠诚”的人流挤开，而且越开越大，越开越猛，以至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便是延续了长达十几年的当兵狂热。

（一）绿色军装：一个时代的流行色

亲身经历过10年动乱的人，谁也不会忘记红色和绿色：红海洋、绿军装。如果略加考证，那第一抹导致全中国感冒般流行的绿色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城楼上。那天清晨5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万众瞩目的毛泽东同志身穿一套缀有红领章红五星的绿军装，由一个年轻的女兵（当然也是一身绿色）陪伴，从天安门城楼下的门洞里出来，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早已等候在天安门广场、穿着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上百万群众频频招手，然后走进群众中同群众代表握手。在群众中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金水桥上。他手拿绿军帽一再向人群挥手，然后戴上绿军帽登上了

天安门城楼。狂呼的人们突然极为敏感地发现了绿颜色的不同寻常的意义。随着那张着绿军装的领袖画像以最快的速度走进每一个会场，走进每一个家庭，走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绿军装也就如同50多年前中山服取代长衫马褂那样，以最快的速度取代了单调的非白即黑的其它一切服装，而成为新的“国服”（谁也没有注意此刻的颜色比非白即黑更为单调了）。当毛泽东第二次出现在万众狂呼的天安门广场时，红色的海洋中已经泛起一片绿波涛。置身于这祖国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群众海洋中，人人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肩挎绿挎包，脚蹬绿解放鞋，俨然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人们一开始就以无比的忠诚把自己当成了“兵”，并举手宣誓：红司令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与此同时，他们的同伴们正高举着战斗队的旗帜，同样身着绿色军装，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气概，踏着父辈的足迹，斗志昂扬地走向井冈山，踏上长征路，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把绿色染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时的绿色已不是简单的流行色彩，它同红语录、红像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内容。因为此刻其它的许许多多颜色，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用扫“四旧”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唯有穿上绿军装才能充分显示革命的坚定性。革命战士穿上了绿军装，主宰整个时代的潮流，其它人便群起效尤。而地富反坏右和一切“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是不配穿绿军装的，因为他们叫做一小撮“黑帮”。有位早年从军队转业的中学校长，常年套着洗得已经退了色的军装，当他被揪上“审判台”时，造他反的革命战士们第一个行动就是剥掉他的军

装，所谓“剥下他披着的画皮”。因为绿色军装是不容“阶级敌人”玷污的。绿军装突然身价百倍，人人都想方设法用它把自己装扮起来。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军营，都以认识革命军人为荣耀，都为穿上革命军装而庆幸。有些女青年给未婚夫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赠送一套绿军装。

在和平建设生活中逐渐被人忽略的军人形象，此时也倏地无比完美起来，高大起来。军人成了时代的骄子。军人们在战争中建立的业绩，被舆论浓抹地重新加以渲染；军人中的英雄，被一再奉为时代的偶像；广播里除了语录歌，即是威武雄壮的队列歌曲；时代一再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绿军装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色的同时，穿绿军装的军人也从军营里走出来了，昂首阔步地走向了社会，像战争年代那样成了时代的主角。他们几乎担任了省、地、市、县所有的第一把手，取代了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登上了上层建筑，担负起管理学校、管理文化团体、管理科研机构的重任。以后他们又成了建设兵团、农建师的当然指挥员，指挥着千百万用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武装起来的一代青年，让他们严格地按照军事化生活。在军人的怀抱里，人们滋生了莫大的安全感和信赖感。尊重解放军，热爱解放军，崇拜解放军，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风范和政治标准。

绿色基因，就这样异常强烈地注进了每一根年轻的血管。

（二）绿色军营：一代男女的理想国

绿色军装的流行极大地刺激了热血青年的从军梦，一代男女朝思暮想去闯军营。1967年冬天，因群众运动泛滥成灾导致两年未征兵的中国，火山爆发般地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当

兵狂潮。这是“文革”发动后的第一次征兵，消息一传开，各地人武部门涌来了人山人海的应征青年。为表示自己誓死保卫红色政权的忠心，他们割破手指写血书，畅开胸膛诉衷肠，流着热泪表决心。只要你大小是个征兵干部，从早到晚都被疯狂的人流尾随着，追赶着，包围着，让你无处藏身。体检站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东方式的羞涩早已抛得无影无踪，男男女女只要听见叫上自己的名字，便风风火火地剥去衣服，赤裸裸然而又是雄赳赳地接受检验。谁要是中途被淘汰下来，立即爆发出嚎啕大哭，抑或像突然中弹似地当场昏死过去。有的在城镇落选了，立即把户口转到农村，改名换姓出现在新的体检站里。名单确定下来后，落选者们竟然通宵达旦地守候在送兵的路口。有的干脆跳上兵车，不辞千里万里地追到部队去，直到穿上军装为止。在湘西，有一年因为落选者们不肯善罢干休，接兵部队决定连夜送兵。在夜色里集合队伍报数时，突然冒出一个清脆尖厉的女高音。武装部长心里纳闷，打亮手电想看个究竟，排头竟站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女子！迎着电光，女子毫无羞涩，昂首挺胸说：“为什么不招女兵？我也要当兵，我会演白毛女！”1969年珍宝岛发生了边界战争，无数青年把枪声当作命令，自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拥向东北边境，坚决要求参军作战。边防部队说得舌敝唇焦，才把一批批青年劝回内地。

最狂热、波及面最广还数军队大院内部。军队大院早有当兵的传统，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行伍意识。当兵狂潮一卷来，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纷纷涌进部队。他们有的只凭着一个电话，一张纸条，就畅通无阻地闯进了另外一个军营；有的来不及领上军装，穿上

父母宽宽大大的军服就走了；有的人到了部队，手续还未办来，即穿着便装参加操练；有的女孩子初潮还未到来，就神气活现地当上了战士。据传，某军队大院在大门口停一辆卡车，凡能爬上卡车的就发给军服。有个军事单位，对凡能搞到军服站到新兵集合队伍里的孩子，全都发给领章、帽徽。某省会一“八一”学校初中毕业班，头天上课教室里还坐得满满的，第二天早晨老师一进门，只见冷冷清清地空出一大片桌椅，一点名少了三十多人。老师逐家逐户去访问，才知道这些学生已经过市出省，都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军队大院几乎没有一家不是两代军人，甚至三代军人。在军营里长大的孩子，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不投笔从戎。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千百万城镇青年被送到偏远的山乡插队落户，送到西北和东北边陲去建设边疆。这更促使一大批青年挤向参军的行列，使各地原已出现的当兵狂潮再掀巨浪。知识青年在落后的农村，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文化水平都有较大的竞争力，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想方设法地打通关节使自己穿上军装。有些建设兵团的女青年面对剧烈的竞争，竟有人宁愿献出自己可宝贵的贞操，也要当兵到部队去，有的到部队数月即发现怀孕，不得不送回地方去。为免除离开部队，她们中有的竟敢以死相威胁。一个部队女作家回忆说：18年前当她还是个16岁的少女，就同哥哥一道被送到西北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去锻炼。她从小能歌善舞，还会拉手风琴，在小学读书时曾被推选出来给外国总统献花。在农建师接受再教育时她做梦也想当兵，当文艺兵。可是母亲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她被列入了黑七类的名册，政审过

不了关。为了参军，她扒上一列货车回到北京，找到某部队一位父亲的老战友求情。这位首长一时为难，她便失声叫他爸爸。后来这位首长便让她改名换姓，以自己女儿的名义把她送到了部队。穿上军装那天，她扑在老首长的怀里哭得涕泪淋漓。还有一位大学讲师的回忆更加让人吃惊。当年他下放在江西农村，几年征兵体检都因身体条件外的原因被淘汰。当他听说我国正秘密出兵越南同美国兵打仗的消息后，一种要当兵上前线的想法使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他当即不辞而别，一路攀缘开往西南去的火车，直闯越南。他藏在军列的篷布下巧妙地过了友谊关。车到越南境内的一个小站，他被越南方面的保卫人员发现了，把他送进了派出所审查。他对派出所的讯问暴跳如雷，说：“我是来参加解放军，帮助你们打美国佬的！为什么阻拦我？”越方无可奈何，只好把他交给我边防部队遣送回村。村民们马上以“叛国”的罪名批斗他，给他挂黑牌。他又火冒三丈地说：“你们批吧，捆吧，斗不死我还要去当兵！”知识青年踊跃当兵，不仅改变了多少年来形成的兵源主要来自农村的趋势，使城市兵迅速上升到30%，而且以它每年高达180多万的数量为部队准备了充足的兵源，把文革中的当兵狂热推向巅峰。

当兵光荣，它不仅使有幸成为军人的青年获得莫大的荣誉，而且光耀了家门，光耀了应征青年的单位，它促使人们发疯般地去撞击军营的大门。然而这份光荣不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得到的。那是阶级阵线异常分明的年代，在有人倍尝光荣的同时，也必定有人倍尝苦涩。不光是所谓的“阶级敌人”的子女，连许多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也挤不上光荣榜。于是就有人为当不上兵而叹息、而消沉、而自暴自